

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新村运动”一举成功改变农村落后贫困面貌，成为创造“汉江奇迹”的重要引擎，为全球津津乐道。

户住着茅草屋，每年四五月份都无一例外会迎来“青黄不接”，百姓生活极端艰辛。韩国《新东亚》月刊曾描述：每年春天一到，几乎家家户户的粮桶都见底了，不少人靠草根树皮为生。缺粮少吃的贫农经常要到地主家借高利贷维持生计，从富农那里赊借高达50%年息的“对半利粮食”。到了春秋的收获季节，好不容易收割来的粮食都要用来还债，手中的余粮也被剥削殆尽。到了农闲期，村庄里不少人都靠酗酒或赌博来打发无聊的时光，一群赌徒完全丧失了干活的欲望，偷、盗、抢劫事件频发。于是乎，近80%的韩国农民陷进高利贷的深渊，看不到希望，更找不到出路。

农村发展一片萧条，也让韩国统治者念兹在兹的国家工业化举步维艰，因为农村羸弱的购买力导致工业品在国内消费市场根本无人问津。不仅如此，农业生产力的严重不足，也让韩国不得不每年花上数亿美元从国外进口粮食，毫无意义地消耗着本该投向工业生产的资本，韩国城乡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迫切需要找到出口。

从政治层面上讲，灾难性的农村贫困问题动摇着韩国国本。当时朝鲜开展“千里马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韩国要高出一大截（1965年朝韩GNP分别为162、106美元），这让执政的朴正熙总统感受到“压

力”。同时，朴正熙还十分担心农村的落后会导致左翼思想向韩国底层渗透，导致自身统治地位的瓦解。

从五大阶段走来

经过反复调研和问计智库，1970年4月22日，以军人威权“说一不二”的朴正熙毫无征兆地在全国地方长官会议上提出“建设新村”的口号，把振兴农村定为国策。在政府主导下，1970—1971年，韩国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进“建设新村”事业，向全国33267个村庄各提供336袋水泥，重点支援农村道路扩建、修建共用洗衣场及自来水设施等。得益于各村庄对“建设新村”的热情和参与，“建设新村”刚迈出第一步就取得超乎期望的成果，从1972年起，“建设新村”事业转而将农

下图：1974年，韩国庆州农民管理稻田。



村环境整治与改善作为下一步工作重点，并推广到全国，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从此拉开了大幕。

韩国《月刊东亚》总结了“新村运动”的大致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目标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菜、畜禽品种等。自1970年冬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资，激发农民自主建设家园的积极性、创造性，塑造勤勉、自助、协同的精神。顶层设计方，内务部（今行政安全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还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经过基础建设阶段，“新村运动”初步改变了韩国农村的环境面貌，引发广大农民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第二阶段是扩散阶段（1974—1976年），“新村运动”迅速向企业及城市扩大，成为全国性现代化热潮。原来行政区划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把之前重在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的工作延伸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韩国政府意识到“带头人”的关键作用，广泛开展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的教育，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政府和国